



正确处理促进共同富裕的几个重要关系

□ 何立胜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正确处理推进共同富裕的各种重要关系，寻找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关系，寻找推进共同富裕的最优解，力争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关系，效率与公平二者是矛盾统一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效率保障公平，以公平促进效率。效率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平影响着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或前提条件，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素效率，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保障分配协调制度的公平前提。公平是提升效率的有利保障，也是提升社会效率的内生要求，脱离公平的效率是难以持续的。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有侧重，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公平的竞争规则和平等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提高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提升社会效率。

正确处理“蛋糕做大做好”与“切好分好蛋糕”之间的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的“富裕”是要做大做好蛋糕，而“共同”则要求切好分好蛋糕。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与前提，通过人力资源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效率，通过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要切好分好蛋糕，而“公平”是底色，制度安排是保障，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低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二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其内在要求是同向的，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前提是做大做好蛋糕，而要持续做大做好蛋糕，也必须把蛋糕切好分好，正确处理做大与分好蛋糕关系的关键，在于分好蛋糕而确保

不伤害做大蛋糕的制度安排。

正确处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之间的关系。共同富裕既包括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富裕，又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富裕。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个形象比喻，就是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促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物质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充实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促进共同富裕既要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实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也要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实现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一般而言，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足的基础，能够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反之，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促进共同富裕，既要不断增加经济收入，又要实现精神是富有的，要求生态环境是友好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正确处理部分人先富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共同富裕决不是少数人或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积极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业创新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是一个逻辑整体，既要鼓励“先富”，激发发展活力，也要带动“后富”，体现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决不能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而是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既强调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又要求增强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区域、城乡及个体间存在适度差异是正常的，不能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同时富裕。而是依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各自遵循不同的原则与要求，三者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互有影响。在初次分配领域，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相应报酬，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激发全社会勤劳致富、奋斗致富的内生动力。再分配是运用政府之手推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为公平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均等化两个层面推进。在税收方面，扩税基、降增值税及中低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增加直接税比例是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向。更加注重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协调区域、城乡间

的社会服务水平，尤其在教育及医疗领域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平衡。三次分配主要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社会责任等。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种有益的补充。

正确处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合理调节高收入与增加低收入之间的关系。依据不同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抓手，采取多渠道促进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农民增收作为重要政策目标，这既是高质量发展、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过程，又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手段。围绕实质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如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合理调节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正确处理劳动收入差距与财产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差距拉大的指标，不仅包括劳动收入差距，还包括因财产收入拉大产生的收入差距。因此，促进共同富裕，既要采取措施缩小劳动收入，又要缩小因财产收入。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既要考虑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的比例，又要考虑因财产收入差距带来的贫富差距。深入研究贫富悬殊、收入差距原因，相对劳动收入差距，财产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要协同调节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健全调节财产收入的制度安排，完善财产收入的政策，增加农村居民住房、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把农村资源变资产，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持续完善再分配制度，增加直接税比例，引进财产性税收，如遗产与赠予、资本利得税等来精准合理调节；切实保护劳动所得，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共同富裕的短期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从阶段性上看，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超越实际发展阶段，国家选取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试点先行、或先行先试的探索，充分考虑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从差异性上看，我国不同地域、

城乡间的资源禀赋不同，每个个体的能力和素质也存在差异。我们确立的共同富裕目标是分阶段递进的，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 and 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 and 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正确处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实践途径之间的关系。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明晰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量力而行的理性、稳中求进的务实，不能制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目标，作兑现不了的承诺。我们决不搞超出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福利主义”，也不能仅依靠加重企业与个人的税负负担、出台过多的社会政策、过多过高承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一是要分阶段、阶梯式促进共同富裕，要保障人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经济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的状态，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尽力而为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性，在继续保持先富人群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加快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或高收入群体的步伐。二是充分认识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或前提，必须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三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实现劳动收入、要素收入的合理平衡，实现公共服务的公平配置。四是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功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主要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用好用活工业数据

□ 廖 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工业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已成为驱动工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引擎，亟须凝聚共识、疏通“堵点”，进一步释放其活力与潜能。

工业数据要素价值初显。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步伐加快，工业互联网应运而生，材料、设备、产品及用户之间呈现泛在连接和在线汇聚的新趋势。工业数据不断积累沉淀，在赋能需求分析、过程优化、敏捷开发、营销决策等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企业生产方式、运营模式和商业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其中，以用户需求数据为基础的个性化定制，利用精准交互和柔性生产，提供多品种、小批量商品；以订单、资源、物流等数据为

前提的网络化协同，采用供应链合作模式，促进资源配置和产能共享；以参数、工况、销售等数据为依据的智能化制造，推动信息自感知、优化自决策、控制自执行，提高效率、质量及安全水平。

疏堵畅通用活工业数据。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工业数据资源丰富，具备开发利用工业数据资源、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良好优势和广阔空间。应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协调产业链上下游力量，打通激发工业数据资源潜力的关键环节，更好地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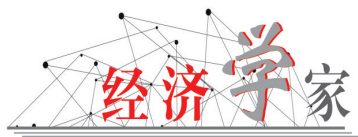
着眼技术创新，打造工业数据服务解决方案。以先进、稳定、安全的技术产品，面向工业数据全生命周期逐个破解难题。一是突破关键技术。聚焦工业数据存储管理、内核优化、边缘处理等领域，提升工业操作系统、实时数据库、应用程序等的自主

可控水平。二是孵化一体化解决方案。加强产需对接和上下游协同，打造集成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功能的工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体系，满足高实时性、高可靠性要求。三是培育服务提供商。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局面。

推进平台建设，畅通工业数据汇聚循环路径。以可用、可信、可靠的基础设施，确保工业数据云服务的专业性符合行业需求。一方面，完善数据汇聚通道。推动接口协议设计的兼容统一，实现全工业要素、全业务流程和全产业链的数据链接及智能交互。另一方面，优化数据汇聚枢纽。研制平台架构、功能、应用、互操作等建设标准，引导平台主动强化工业数据融合分析、应用开发、资源调度等基础服务能力。

聚焦流通共享，构建工业数据赋能协同生态。以开放、包容、绿色的

生态体系，激发工业数据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方面的效能。一是支持深度合作。鼓励工业数据所有者、需求者及服务者共享、共谋、共创，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以互信空间消除数字鸿沟，打破数据孤岛。二是激发市场活力。规范数据确权、数据定价等交易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繁荣工业数据消费市场。三是深耕价值挖掘。发挥我国工业领域规模大、门类全、场景多的优势，基于流动的“活数据”，持续增强供需契合度，重塑生产制造体系。



王 东 京

读大学前我一直以为：老百姓将钱存入银行（储蓄）是好事，可支持国家建设。可上大学后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凯恩斯说：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出现普遍的失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老百姓喜欢往银行存钱，令消费增长跟不上收入增长。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消费品生产过剩。

说实话，自己在大学求学整整10年，对这类观点不曾怀疑过。尽管上世纪70年代西方陷入“滞胀”后，学界千夫所指，凯恩斯成为众矢之的，而我认为西方国家用错了药方。我对《通论》产生质疑，是1998年，当时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国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而中国却有惊无险，很快度过了危机。

面对大规模失业，中国能有惊无险，当然是政府应对得当；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存款”。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作过调研，访问过下岗职工。职工反映，下岗后政府发了救济金；加上自己有些存款，才供得起孩子上学。一语点醒，让我意识到“储蓄”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回北京后，我写了《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一文，对“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提出质疑，并对“储蓄”与需求的关系作了分析。可不敢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对中国高储蓄群起攻之。

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美国代表又公开指责中国高储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作了回应，我也写了《美国指责中国高储蓄毫无道理》，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自1992年至2009年，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为何20年前美国未发生金融危机？10年前也未发生金融危机？只能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高储蓄无关。

以上说的是往事，回头再说现实：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出口，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而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面对双重压力，2020年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调用消费带动投资。于是“高储蓄”再度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而要扩大消费，必须将“高储蓄”降下来。

看来，人们对“储蓄”存在不小的误解，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前面提到的“东北下岗职工”的例子足以说明，“储蓄”对家庭具有一定的“缓压”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储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储蓄并不会抑制或减少总需求。何以作这样的判断？让我从两个角度作分析：

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居民为了取得利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存入银行（储蓄）；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后，需给储户支付利息。我们知道，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利润来自存贷利息差。银行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亏损，会立即将存款贷放给企业。如此一来，储蓄则通过银行转化成企业投资，社会总投资需求会增加。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银行储蓄，他的当期消费会减少，但社会总消费未必会减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当社会上投资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时，银行会将“储

高储蓄不会抑制需求

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贷款。于是，张三的“储蓄”转化成了李四的消费，此消彼长，总消费需求不会变。第二，是“生命周期假说”。此假说认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会等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是说，“储蓄”是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平衡”消费的理性安排。

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并且举例子反驳说：美国和中国各有一个老太太，两人的消费观念不同。美国老太太年轻时不仅不储蓄，反而从银行贷款买了房子；中国老太太却喜欢存钱，直到退休才买房子。这样，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自家的房子，中国老太太退休后才住上自己的房子，明显地吃了亏。其言下之意，中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应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不储蓄而贷款买房子。

这个例子确实有迷惑性。可我想追问的是：美国老太太贷款买了房子，每月是否需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后是否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中国老太太将钱存入银行有利息收入，收入增加是否可以买更多的新衣服，或者增加旅游、健身等方面的消费？再有，租房住与买房住都是消费，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怎能说储蓄就一定减少消费呢？

最后总结本文结论：储蓄不过是人们对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进行权衡后的自由选择。有人希望增加未来消费，今天愿意储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费，愿意从银行贷款。逻辑上，只要银行将存款全部贷出去，无论储蓄率多高，皆不会抑制国内总需求，所以高储蓄不应受到指责。